

第三章 唐诗的流变

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唐诗，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趋向和主要特点，大体可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不妨对这三百年间诗歌发展演变的过程做一番巡礼。

一、初唐革新

初唐，从高宗武德元年（618）到玄宗开元初，约一百年，是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过渡阶段，也是唐诗兴盛的准备阶段。一代英主唐太宗鉴于南朝历代统治者败亡的教训，从巩固基业的需要出发，重视思想文化的统治作用，提倡中和雅正的文学主张。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奉命而作的应制诗和君臣之间的唱和之作，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表现宫廷生活和写景咏物。虽文辞典雅、内容空洞，毕竟摆脱了齐梁诗歌的轻靡浮艳，初具盛唐气象的萌芽。

初唐时期，先后出现了一些宫廷诗人。他们的主要功绩，是在形式上推进了律诗的完善和定型。早在齐梁时期，诗坛上便已出现对偶说和声病说，至北朝后期和陈隋诗人，五言诗的律化更进了一步，有少数诗篇已经符合唐人定型格律的规定，但在理论上没有提出新的总结。高宗龙朔年间，显贵之臣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将六朝以来诗歌中的对仗方法加以程式化。宫廷文士沈 期、宋之问“研炼精切，稳顺声势”，“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总结了五七言近体的形式规范，并且以他们工致细密、格律精严的创作，为律诗体制的形成和影响的扩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沈 期《古意》（闻道黄龙戍）写长安少妇在

秋夜的捣衣声中思念远征不归的丈夫，宋之问《度大庾岭》抒发去国远谪的忧伤和怀土思归的向往，已然是全体合律的五言律诗。从武后至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在当时的一批宫廷诗人笔下已大量涌现平仄协调、合乎粘对规则的全篇合律的诗，标志着五、七言律诗的完全成熟。如“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起结承转，章法严密，对仗工整，句律精严，被胡应麟推为“初唐五言律‘独有宦游人’第一”（《诗薮》内编卷四）。发端于齐永明的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化过程，经过两百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至此终于完成。此后，律诗的规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风气之盛，已越出宫廷圈子之外。^①

初唐宫廷以外的著名诗人王绩，因仕途失意而归隐，作品表现了他愤世嫉俗、蔑视礼法的思想感情，也流露出颓放消沉的情绪。其诗多写山水田园，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前驱。运笔自然质朴、风格淡远，在沿袭齐梁遗风的初唐诗坛独拔于流俗之外。田园诗代表作《野望》为其晚年归隐东皋时所作，写薄暮观望山野秋色，抒发了无所依归的苦闷心情。风格自然淳朴，意境浑成，虽比律诗定型早六十年而已然对仗工稳，严整合律。

号称“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不仅“以文词齐名天下”，而且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明确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尽管四杰的诗歌并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的影响，但他们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贵族社会，较早地唱出了时代的声音。一方面，他们拓宽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使诗歌从

^① 参见章培衡、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宫苑台阁走向江山和塞漠，走向广阔的时代生活。同时在诗歌中倾注了关注边事的爱国热情，追步前贤的豪迈意气，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干预现实的愤慨不平，以新鲜的内容和刚健的风骨，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并构成唐诗发展中重要的一环。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写送友人入蜀赴任，抒发了作者惜别的真挚情意和旷达开朗的襟怀，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格调高朗，千古流传。杨炯《从军行》抒发了投笔从戎、慷慨报国的壮烈情怀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风格刚健雄浑。骆宾王《在狱咏蝉》是诗人任侍御史时因上书议论政事，得罪武后，被谗入狱时所作，诗中借蝉自况，表达了无人可为申诉冤屈的痛苦心情。物我融合，寄托遥深，极见功力。

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力求振拔，不仅表现为内容的拓展和充实，也表现为形式的创新。他们有意以新的章法和节奏，来表现新的情绪。奠定了五律的基础，发展了七言歌行。“诗人们在汉、魏、六朝（特别是梁、陈）以来七古与赋（尤其是骈赋）交互影响、同步共进的诗史条件下，在歌行中大量糅合了赋体的特点，同时，较自觉地继承了汉、魏以来诗歌重气的优秀传统，以适应宏阔气象的抒发，从而创制出一种虽然整密高华，然而血脉动荡、气势宏大的长篇歌行，成为盛唐七古的当之无愧的先行。”^①如卢照邻《长安古意》依照从昼到夜的时间顺序，描写帝王公侯、将相以及豪门子弟、任侠少年、倡家乐伎等各类人物的生活，展现了长安繁华兴盛的社会风貌。最后以寂寞著书的扬雄与之对照，点出繁华难久，好景不常，权贵们一时的骄奢，终不如寒士名节久远的主题。形式上以赋为诗，长篇巨制，破奇为偶，开初唐近体歌行的先河。

继“四杰”之后，陈子昂针对从上官体到沈、宋不断发展

^① 赵昌平著《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着的宫廷诗风，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进行诗歌内容的革新。他反对“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标举“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高倡恢复建安文人的慷慨意气和人生理想，以矫正诗界软弱柔靡的倾向。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架起了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之间的桥梁。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表达了他的诗歌革新主张，以《感遇》三十八首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则是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三十八首诗非一时一地所作，作者或感慨时事，或感伤身世，以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对政治、道德、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观照与思考。《登幽州台歌》抒写了作者纵观古今的慷慨悲凉，在现实社会中怀才不遇、遭受压抑的悲愤孤寂，表达了积极用世建立不朽功业的恢宏气魄和强烈自信，意境苍凉雄浑，感情深沉悲壮，成为反映时代要求、浪漫精神和人生理想的黄钟大吕。与振聋发聩的《修竹篇序》一样，不仅震撼了初唐诗坛，而且以它要求突破现实的豪迈气概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呼唤着盛唐诗歌的到来。

陈子昂的贡献，在于抓住了历史的契机，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清除了南朝诗歌和唐初宫廷诗风的弊病，为唐诗注入蓬勃的生命力。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影响的复古呼声，但绝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在复古旗帜下进行的革新，促成了诗歌声色与性情的统一。这是唐诗走向高峰的因素之一，也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途径。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诗歌已逐渐显示出开阔壮大的气势、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和庄严的宇宙意识。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他的《春江花月夜》是著名的七言歌行，被后人誉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诗中表现的虽是游子思妇的传统主题，但将相思离愁置于春江花月之夜浩瀚幽远、静谧瑰丽的境界之中，以如梦如幻般澄澈优美的境界，略带凄凉感伤而绝不消沉颓废的音调，对

青春年华和生命宇宙的理性思考，展示出清新健康的审美风貌。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宛转和谐，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包含了丰富广泛的人生哲理。这一切标志着诗歌发展距离盛唐高峰已经不远。自此以后，这些富有青春旋律的诗篇就如潮水般涌来，成为唐诗的鲜明特色之一。^①王湾《次北固山下》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二句意境壮美，寓新生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哲理。宰相张说手题此联于政事堂，令为楷式，仿佛预告了诗歌高潮就要到来。

初唐将近百年的时间里，从太宗的初露端倪，到四杰的有意革新和沈期、宋之问完成近体格律诗的创建，再到陈子昂的横制颓波，一步步地接近盛唐气象，唐诗高峰的出现已是水到渠成。

二、盛唐气象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诗歌史上的盛唐。经过一百多年的准备和酝酿，唐诗终于走向了全盛。高度繁荣而又极富浪漫气质和艺术氛围的开元盛世造就了一代人胸襟开阔、抱负远大、乐观自信的精神风貌，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充满风云际会的幻想，以比他们所追慕的建安文人更为高涨的热情、更为豪迈的气质、更为坚定的信念，去观照社会、体验人生。不论个人遭际如何，无论感情快乐或悲伤，都开朗健康、豁达从容，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和无限的希望，形成盛唐诗歌所特有的理想主义、英雄性格和浪漫色彩，谱写了一曲曲华彩的乐章，确立了“盛唐气象”这一诗歌范式。他们“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

^① 参见闻一多《唐诗杂论》，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太康不逮”（殷 《河岳英灵集序》），以骨气端翔、兴象玲珑、含蕴深厚、韵味无穷的美学风貌，创造出为后代诗人所追慕和艳羨的“盛唐之音”，也创造出千百年来古典诗歌中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

盛唐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和许多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作。

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在诗风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或抒发自己的功业抱负和人生价值的追求，或在穷达进退中砥砺自己的人格操守，都抑制了文学的浮华倾向。同时，他们以宰辅之尊大力延纳才士、奖拔后进，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说是盛唐前期的文坛领袖，与许国公苏 并称“燕许大手笔”。其诗主要讴歌功业抱负，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这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代表作《邺都引》变初唐卢、骆等人歌行的铺陈为简洁凝炼，气势充沛，风格已接近盛唐歌行。所以沈德潜评此诗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体远矣。”（《唐诗别裁集》）由于张说在文坛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其诗作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

张九龄是张说之后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位名相，也是深为时人崇仰的文坛宗匠。他的诗更多地表现了如何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艺术表现上，以兴寄为主，委婉蕴藉。代表作是《感遇》十二首，如其一“兰叶生葳蕤”，比喻贤者不随俗从流、不求悦于人。诗风清淡，情景交融，物色与意兴浑然一体。《望月怀远》在澄澈优美的月夜描写中，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张九龄清澹的诗风对唐代山水田园诗人有很大影响。胡应麟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风神也。”（《诗薮》内编卷二）

盛唐诗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卓然崛起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

诗派，他们各自以或宁静优美或奔放壮丽的旋律奏出了不同凡响的盛唐之音。

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山水田园，经王维、孟浩然、储光羲、裴迪等诗人的开拓，提升到新的境界，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特别是山水诗，更是蔚为大观，不论思想内涵还是艺术造诣，都攀上了艺术的高峰。诗人们用生动传神的诗笔再现了大自然的多姿多彩，倾注了对自然之美的衷心喜爱；在山林溪壑之中，寄托了自己不与俗世合流的人生理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盛唐时代具有浪漫气质的文化氛围。盛唐山水田园诗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而且为后人描写自然景物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尤其是王维的诗，在诗情画意的互相渗透和生发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

孟浩然不论是对山水题材的开拓，还是笔墨清淡意境浑成的风格，在盛唐诗坛都可谓开风气之先。《夜归鹿门歌》写于作者前期隐居鹿门山（在今湖北襄阳）之时，描绘了黄昏时分归鹿门的情景和入夜所见景色，表现了恬静幽寂的隐士生活。此诗写景如画，境界幽深，感情冲淡，语言简约，虽句句押韵，节奏急促，却有行云流水之妙。《宿建德江》写暮江泊舟所见江景，将羁愁旅思与秋江景色自然结合在一起，衬托出人的孤寂。风格清淡，意味深长。《过故人庄》写作者到友人的村庄做客，表现了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简朴可爱的农家生活，及宾主间淳真的友谊。一首五律却如古体一般自然流畅，风格清新，意境浑成，达到很高的艺术造诣。出入古近的体格而洒脱自在，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

孟诗中还有《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夏日南亭怀辛大》、《春晓》等名篇，或气势雄浑，或恬淡孤清，或语浅情深，显示了作者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多方面的才能。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标志着这一题材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由于他既精于诗道，又深悟画理，因而诗中充满诗情画意。苏轼

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志林》）王维笔下的山水景物丰富多彩，风格各异：有的气象雄伟，境界开阔；有的清新秀丽、优美静谧；有的色彩鲜明，有的萧疏简淡。每一类诗都有不少佳作。然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创造性的，还是那些描写隐逸终南、辋川的自然景色和闲情逸致的作品，如《辋川集》中的《鹿柴》、《竹里馆》、《辛夷坞》等。这些诗既有精细的刻画，又注重完整的意境；既鲜洁明丽，又冲淡空灵；既体现了禅宗哲理，又情味深长隽永。因此千百年来传诵不绝。

王维在诗体的运用方面也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五律沉雄慷慨，意气飞动；五绝写景自然，超妙传神；七绝语浅情深，音节优美。

这一时期以山水田园诗著称的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等。储以田园诗见长，多寓意寄兴；常建诗旨远兴僻，好以光和影写幽深空寂的感觉，代表作《题破山寺后禅院》为时人所推重。祖咏《终南望馀雪》乃试帖诗，称“意尽而止”，成为写雪的名篇。

王维等盛唐山水田园诗人所代表的“盛唐正音”，不但牢笼了与之同时的大批同调的诗人，还直接影响到后来刘长卿、韦应物以及大历十才子的审美趣味和创作格调，并成为宋以后诗人们潜意识中的盛唐之音的正宗代表。

边塞诗以震撼人心的崇高美成为盛唐时代最慷慨激越的歌唱。高适、岑参、王之涣、王昌龄、李颀、崔颢等一大批诗人，尽管个人仕途大多落拓不遇，却为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所激荡，在边塞诗苑中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情和才华。盛唐边塞诗使初唐以来以“风骨”为号召的诗歌审美理想得到血肉丰满的表现。

高适以一首《燕歌行》奠定了他边塞诗代表诗人的地位。此诗有感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幽州节度使张守节与奚族作战打了败仗却谎报军情一事而作，综合了作者的见闻，以高度的艺

术概括和极其凝炼的笔墨，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描写了边塞战争，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典型性。诗中以错综交织而又宾主分明的诗笔，生动展现了从慷慨应征、转战绝域到战败被围、短兵相接等一系列场景，并通过这些描写，歌颂了广大士兵保卫边疆、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谴责了军中将领的骄纵轻敌、荒淫失职；揭示了军中苦乐的不均；慨叹边地将领不得其人。此诗用七言歌行，四句一转，气势流畅，笔力矫健，多处使用对比手法，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不愧是唐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他的送别诗《别董大》声情慷慨，气势豪壮，既是对友人的安慰体贴，更包含着对友人的理解、信任与期待。从中显示出盛唐文人对前途的乐观自信和友谊的巨大精神力量。

高适的七言歌行也具有创造性，不仅上承四杰以来歌行的体制，还吸取了汉魏古诗简老遒壮的特色，气势浑雄而飞跃自如，在驰骋纵横中以“筋骨”取胜。故殷 称赞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河岳英灵集》卷上）

岑参一生中曾三次出塞，丰富的边塞生活的阅历，生来“好奇”的性格，使他对充满异域情调的风土人情，尤其是西北边地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他的边塞诗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新奇，风格独特。《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代表作，想象奇特鲜明，语言雄奇瑰丽，善用比喻、夸张，富有奇情异彩。其中，《白雪歌》尤为出色，作者将白雪和送别交织在一起，以瑰丽壮阔的雪景衬托出依依惜别之情。用夸张的笔墨勾勒出军营内外奇丽壮观的浩瀚雪景，渲染了天气的奇寒。“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新奇美妙的比喻，将冰天雪地的塞北风光变成春意浓郁、梨花怒放的江南胜景。将想象与现实、夸张与具体、奇妙与真实结合得如此和谐，唐诗人中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殷 《河岳英灵集》（卷上）评其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这种奇，既是客

观事物本身特质的再现，更是诗人丰富的艺术心灵的外化。岑参不仅以独具一格的创造开拓了边塞题材的崭新境界，也是对唐诗领域的极大开拓。

王昌龄的边塞诗有很高的艺术概括力，其着眼点往往不在于具体的战事，而是把边塞战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各个视角上进行深入的思考。以深刻的内涵，饱满的热情，突破了六朝以来边塞诗主要就乐府旧题加以敷衍的固有程式，使之更富于生气。组诗《从军行》或写征人久戍思家之念，或抒将士克敌卫国豪情，或表达战争胜利的喜悦，均意态雄健，音节高亮，言近旨远，语浅情深。《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高度概括了秦汉以来边患不息、征戍无已，无数士兵不得生还的悲惨历史；并借缅怀古代良将，表达了希望国家将帅任用得人、巩固边防、实现和平的愿望。笔力雄浑、深沉含蓄，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

王昌龄大力写作七绝，并使之神固气完，成为后人的范本，因而有“七绝圣手”、“诗家夫子”之称。他的七绝善于捕捉最有包孕的片刻，表现人物刹那间对外界事物的感触，并精心处理绝句中的每一句。如起句骤响易彻，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次句顺承；第三句另辟新境，翻出新意；结句含蓄蕴藉，不令语尽思穷。对唐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体——七绝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通过描写塞外荒塞景物，透露出征人生活的艰苦和久戍思家的哀怨，表现了作者对戍卒的深厚同情。诗意顿挫曲折，抒情含蓄委婉。当时便“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其《登鹳雀楼》写作者傍晚登楼所见山河胜概，气势恢宏，景象壮阔，于叙述登楼行动中寓登高才能望远的深刻哲理，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高瞻远瞩的宽阔胸襟，全篇对仗而自然流畅，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李颀《古从军行》放眼于历史上和亲与交战反反复复的现象，把笔触伸入到积怨不解的胡汉双方，揭示了统治者好大喜

功、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无尽无休的灾难，对被征讨的“胡儿”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把边塞诗的思想境界提到了新的高度。

崔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河岳英灵集》卷中）。《古游侠呈军中诸将》、《赠王威古》等作，都以少年游侠的形象自况或喻人，具有豪迈勇武的气息。但他最著名的诗是抒写怀古思乡的《黄鹤楼》，写登上黄鹤楼所联想到的有关传说，以及眺望江景触发的思乡之愁。诗从“黄鹤楼”三字着笔，托想空灵，寄情高远，连用三句“黄鹤”，有一气旋转、高唱入云之妙，被后人推为“古今七律第一”。其独创性的手法对李白产生一定影响。

盛唐诗潮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而其中最引人瞩目、动人心弦的，当然是李白的创作。李白是这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诗表现出一种春风得意的蓬勃朝气，热情奔放的青春旋律。他那追求理想的坚定执著、英雄失志的愤激不平、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爱好自由的叛逆个性，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宏放气魄和雄伟力量。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士一样，具有宏大的功业抱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是他最执著的人生信念。他一生高自期许，以布衣之身藐视权贵，无所顾忌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社会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的英雄主义。他把古诗中反权贵的主题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地步，而这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魏晋以来重视个人价值和气骨传统的最大限度地继承和发扬。

李白的理想主义、浪漫精神在山水诗中表现最突出。他笔下的山水往往呈现出两种境界：一种是借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表现他渴望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热切心情和壮伟不凡的襟怀。另一种是以安谧纯静而又充满生机的自然境界，抚慰他在现实中屡遭碰壁的悲愤和不平的心灵。李白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

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艺术上，李白以其绝世的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如行云流水而又变幻莫测。他抒情的方式也往往不是含蓄收敛的，而是有如山洪暴发，喷涌而出，一气直下。他的诗常常充满大胆惊人的夸张、丰富奇特的想象，还常常借助于神话传说、梦境和幻觉构成瑰丽神奇的境界，如《蜀道难》一开始就借用五丁开山的古老传说烘托出蜀道奇险的气氛，并通过想象和夸张描绘了一幅幅奇山险水、令人惊心动魄的图画，表现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梦游天姥吟留别》驰骋丰富的想象，将梦境描写得色彩奇幻，令人目眩神迷；将仙境描绘得五彩缤纷，辉煌神奇。以此反衬现实社会的污浊和令人憎恶。他的语言如杜甫所称赞的呈现出清新俊逸的风格，达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江夏韦太守》）的理想境界。如《古朗月行》、《宣城见杜鹃花》、《山中与幽人对酌》、《横江词》、《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早发白帝城》等，都用极纯净自然而又豪放有力的语言表达了极深厚的感情。李白还注意学习民歌语言和当时的口语，使诗歌自然流畅，饶有民歌风味，如《长干行》等。在诗体的运用上，李白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的七言歌行、七绝，都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总之，李白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成为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他继承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以自己成就卓越的创作实践，扫清了六朝的绮靡诗风，为唐诗的繁荣和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正如李阳冰所说：“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草堂集序》）李白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即在于此。

正当唐诗发展到它的高峰的时候，玄宗天宝十四载（755）

安史之乱爆发，唐代社会迅速地由它繁荣的顶峰走向动乱与衰败。唐诗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盛唐时期那种兴象玲珑、骨气端翔的境界逐渐淡化，充满自信、富于理想色彩和浪漫情调的歌唱也逐渐消歇。代表这一时期的伟大诗人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直面社会现实，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真实反映了天宝末到大历年间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以及唐王朝由盛到衰这一转变关头的苦难岁月，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

如果说李白是将诗歌的浪漫主义推进到一个高峰，杜甫则是继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把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成熟的阶段，他自觉遵循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传统，在揭露封建当权势力的腐败、贫富的对立、表现民生疾苦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被誉为“诗史”。他沉郁顿挫的写作风格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而且直接开启了中唐新乐府诗的创作，并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诗又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从表现对象到方法，从体裁到修辞，都对前人遗产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杜甫善于通过典型事件、人物及警策凝炼的语言，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同时善于把强烈深沉的抒情融入叙事手法中，以叙事手法写时事。从题材到写法，都不同于盛唐诗，标志着唐诗发展中的一种转变。在诗体运用上，杜甫众体兼长，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尤精于律诗，格律谨严，章法整饬，对仗工稳，技巧圆熟而多变，代表了唐代律诗的最高成就。同时在语言运用和艺术表现方面也为后人开了无数法门。

时代和独特而丰富的生活经历成全了杜甫，加上他深厚而广泛的艺术修养，对前人遗产“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正确态度，“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精益

求精的锤炼技巧，这一切使杜甫成为古典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元稹高度评价杜甫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杜君墓系铭》）得到后人的广泛认同。

三、中唐之音

盛唐诗是唐诗史上的高峰，却并不是它的终结。摆在中唐诗人面前的，是诗歌经过盛唐高潮之后盛极难继的局面。因此，如何摆脱盛唐诗风的笼罩，开创新的诗歌境界，便成为他们的重要课题。众多诗人立足新变，大胆探索，独辟蹊径，各擅胜场，由此而出现了一种多元化艺术追求的趋向。特别是从德宗贞元中到穆宗长庆末，伴随着经济、政治上革新思潮而来的是文学革新的思潮，就此迎来了唐诗的第二次繁荣。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的语言为其艺术特征；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艺术上追求新奇险怪；李贺以绚丽的色彩、奇特的想象、感伤的情调独树一帜；刘长卿、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各异，都有独到的成就。这是一个诗歌创作趋于个性化的阶段，诗坛出现了虽不如盛唐诗坛那么光芒四射，却更加色彩纷呈的局面。正是由于中唐诗人不满足于守成而立足于创新的种种努力，唐诗才得以在难乎为继的盛唐高峰之后别开生面。中唐诗人的杰出成就和艺术上的探索，不仅丰富了唐诗自身，而且衣被后人，他们勇于创新，以变求通的精神，尤其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光辉的范例。^①

中唐诗歌的发展变化，除元稹、白居易曾提出过讽谏说和主

^① 参见陈贻 著《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一集，《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79年版。

功利的诗歌主张之外，总的趋势是朝着诗歌自身艺术的探讨、发挥与完善的方向发展的。如在意境创造上，诗人或雕琢炼饰，追求丽藻与远韵的统一；或崇俗尚质，追求浅切尽露的平易之风。刻意追求“笔补造化”的人工之美，已不同于盛唐诗人注重兴象和情韵的自然浑成。此外，他们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与此相关的意象明显增多；他们对语言表现形式的关注，也比盛唐诗人更为深入。

中唐的诗歌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20余年，即大历、贞元间，诗歌创作处于低潮。此时，王维、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已相继去世，活跃在诗坛上的是刘长卿、韦应物及被称为“大历十才子”的一批诗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太平盛世度过的，受到过盛唐文化的熏陶，仍然关注社会，怀有入世的热情和济世的理想。但由于他们亲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乱后的破败萧条、时代的盛衰变化，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怀，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和消极避世的情怀。这一切，折射到他们的诗歌中，便是有盛唐馀韵而气骨顿衰。一方面，他们仍然关注社会，试图在拯救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内心也不时地迸发出激情与豪气，但另一方面，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以及软弱的性格，又使诗人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逃避战乱的现实生活，追求宁静闲适、冷落寂寞的生活情调，多应景献酬、流连光景、粉饰现实之作，风格也由盛唐诗歌的自然浑成、奇伟壮丽转向崇尚高情、丽辞、远韵。在诗歌从盛唐转向中唐的大变中，起到过渡作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元结、顾况注重反映现实人生，可视作杜诗的同调，也是杜甫与白居易之间的桥梁。刘长卿、韦应物以山水诗见称，艺术上继承陶渊明尚自然、谢灵运尚精工的传统，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此外，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①

① 参见罗宗强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贞元、元和年间，社会处于大乱之后的相对稳定时期，向往中兴成为人们的普遍心态。与政治改革同时，诗坛上也出现了革新的风气。这一时期的诗人，在盛唐那样难以企及的高水平上，以他们的革新精神和创新勇气，又开拓出一片诗歌的新天地。

韩孟诗派在个人风格上差异甚为明显，但在尚怪奇、重主观这一基本倾向上却趋于一致。他们有意打破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避熟就生，标新立异，形成奇崛险怪的风格。不仅在唐诗中别开生面。而且在诗歌史上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唐帝国的繁盛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一群诗人又大多遭遇坎坷，在社会中感受到沉重的压抑，因此，他们所表现的，往往是自己丰富敏感有时却是扭曲甚至变态的心灵、情感；他们所展示的世界，往往是非世俗的，甚至是怪异的、变形的；他们所采用的内容、体式、句式、意象，很多是以往不曾入诗的。

韩愈无疑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一位风格独特的大诗人。他的诗气势宏大，尚险好奇，瑰丽奇崛，表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面貌。如他的《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展现出终南山春夏秋冬、外势内景全貌。他“以文为诗”，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对宋诗“散文化”特点的形成，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叶燮《原诗》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

孟郊以苦吟著称，他用“钩章棘句，擢胃肾”（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式的险奇艰涩僻字险韵与生新意象表现心理的压抑、不平，把内心的愁哀刻画得入木三分和惊耸心魂。与孟郊并称的贾岛，诗歌内容上多抒发个人孤寂凄清的心境和闲适淡泊的情趣，艺术上讲究遣词造句，特别注意“诗眼”的锤炼，使五言律体走向了工巧、精警、圆熟的道路。虽境界狭小，气象萧瑟，影响却一直及于宋末。这一派诗人还有姚合、卢仝、刘叉

等，诗风都以怪异艰涩著称。

李贺这位早逝的天才，从个人的悲剧命运出发，在诗里集中表现了个体生命在自然和社会双重压抑下的感受和体验。其诗以奇异的题材、独特的构思、浓丽的色彩、奇诡的想象、幽冷的情调，于中唐诗坛独树一帜，被称为“长吉体”。他奇崛冷艳、虚荒诞幻的诗风，主要体现在他独特的创造性思维、超越现实迥异常境的想象夸张、大量虚幻意象的营造、奇异峭拔的遣词造句，以及通感、比喻等修辞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上。较之前人他格外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而比较忽视客观事物的固有特征和理性逻辑，即使是日常生活题材到他笔下也迥出常情，呈现出奇诡迷离的艺术境界，给人以心理的刺激。由此，给中国诗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

总的说来，韩孟诗派及李贺虽有时因翻新出奇而流于晦涩险怪，却避免了中唐诗风滑向柔弱浮荡一途，并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尽管由于过于标新立异带来了一些弊端，但这些诗人所显示出的对于艺术独创性的追求和他们的创造才能，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与此同时，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一派诗人，自觉发扬杜甫的写实精神，明确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乐府诗的创作。他们以诗为揭露时弊、讽喻现实的工具，强烈关注社会政治问题，恢复了中国古典诗歌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们曾把这一新诗潮称为“新乐府运动”。

在艺术表现上，与韩、孟一派诗人相反，元、白的诗一是注重写实，善于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加以选择、提炼和概括，刻画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二是倡导平易通俗的诗风。讽喻诗主题明确、形象鲜明、对比强烈、语言通俗自不必说；其他题材，也努力以浅切平易的语言、自然流畅的意脉来增加诗歌的可读

性。叙事抒情意到笔随，改变了此前过分雕琢的诗歌语言习惯，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诗歌风格，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这与白居易诗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发展了新的诗歌语言有直接关系。《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是叙事、抒情相结合的典范，不仅风靡当时，而且传之久远。对古代叙事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除讽喻诗外，元稹在悼亡诗和艳情诗的写作上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悼亡诗写对妻子的怀念追忆，丧妻的哀痛憾恨，均从生活琐事着笔，以口头语道出，却情深意挚，感人肺腑，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元稹与白居易互相唱酬，争奇竞巧，写了不少长篇排律，动辄百韵，亦风靡一时，在元和时被称为“元和体”。

这一派诗人还包括张籍、王建、李绅等。张籍善以“俗言俗事入诗”，从中发现和发掘蕴含其中的社会意义；并善于提炼情节和语言，达到言浅意深和言简意赅的境界。故王安石称赞他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王建诗在表现和体察民俗民情民间生活方面较张籍更加细致入微，且更加通俗化、口语化。李绅是最早以“新题乐府”为题进行创作的诗人，惜二十首诗已经失传。今只存《悯农》二首，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在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之外，中唐诗坛尚有柳宗元、刘禹锡等自成一格的诗人。他们虽不像韩孟、元白两大诗派那样具有十分显著的创新特征，但在手法节制简约，语言干净明快，扩大和加深诗歌的内在意蕴方面，显示出与两大诗派的不同。刘禹锡写诗注重立意，内容深刻，风格警拔，五七言近体成就尤高。其中怀古、咏史七绝，往往借此言彼，小中见大，凝炼警策，含蓄蕴藉，颇多名篇。他性格开朗达观，善化低回哀婉之音为慷慨激越之韵，风格豪健雄奇。长期贬谪的经历使他在借鉴民歌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一些抒情小诗，采撷朴素生动的口语，运用俚歌俗调

的形式，既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歌清新开朗的情调，又有文人创作宛转悠长的风韵。

柳宗元诗多作于被贬之后，其中抒情诗和山水诗最有特色，成就也更高。这些诗大多寓情于景，通过模山范水抒发被贬远荒的幽愤和去国怀乡的情思，从中显示其清峻高洁的品格。他善于将个人的志趣与对国家衰退的忧思结合在一起，宏阔的境界与萧瑟的景物交织在一起，风格幽峭明净，淡泊简古。苏轼称其诗“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高度评价了柳诗的成就。

四、晚唐风韵

穆宗长庆以后，唐王朝危机进一步加深，士人心态亦随之发生变化。适应时代的变迁，唐诗风貌再次发生明显转变，由中唐进入晚唐。从文宗开成到昭宗天佑，大约七十年光景，国势江河日下，诗运亦如国运，呈现出衰落趋势。晚唐诗人面对国家无法挽回的颓势，眼看个人理想无着，抱负成空，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没有了盛唐时代自由奔放的朝气，也没有了元和时代愤世嫉俗的勇气，而是为感伤和衰飒的气氛所笼罩。诗人们在历史的追怀中寄托对现实的不满，在对山水的眷念中抒发无力回天的哀挽，在对情感的追求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就在诗坛日渐滋长的华靡纤巧的颓风中，号称“小李杜”的杜牧、李商隐却如异军突起，他们既怀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忧国忧民之心，诗歌创作上又继承了李、杜的精神和艺术，刻意探求，善于出新，在感受的细腻深切、手法的深曲新奇方面甚至超过前人。杜牧诗辞采清丽，风调俊爽，工于七绝；李商隐诗精丽婉曲，深情绵邈，擅长七律。不论伤时忧乱，抒情言怀，或是咏

史怀古，写景咏物，都既不同于盛唐气象，也与中唐之音大异其趣，而是别有天地的晚唐风韵。为唐代的灿烂诗国涂抹了最后一道绚丽的霞彩。正是有了他们，唐诗才得以形成初、盛、中、晚四个各具特色、互相辉映的阶段，享誉千古之后。

杜牧生于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晚唐，自幼便有经邦济世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的古体诗多揭露时弊和表达他对现实的关切。咏史诗讽刺帝王的荒淫，议论朝政得失，艺术上很有特色。或采用传统手法，借古喻今；或以诗论史，具有史论色彩。后者富于创新，为许多诗人所仿效。杜牧的写景抒情诗也取得很高成就，他既善于用清丽凝炼的语言勾勒鲜明的景物意象，又善于把深沉悠远的情思寄托在具体的画面之中。如《泊秦淮》以凄迷朦胧的江边月色和柔曼颓靡的流行曲调，构成一幅色彩凄凉暗淡、人物醉生梦死的世情生活图画，在清醒与麻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比照中，传达出浓重的忧时嫉俗的感伤情怀。《江南春》在具有季节和地域文化特征的景物描绘中，自然融进历史兴亡的深沉感喟。由于晚唐一蹶不振，个人际遇也不顺利，理想与现实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杜牧于是失意消极，甚至放浪声色、玩世不恭，白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名”（《遣怀》）。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唐以后士大夫追求享乐的浮华习气，同时也表明了作者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消极态度。

杜牧论文主张“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白云“某苦心为诗，唯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其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以七绝最为人称道，其次是七律。总之，明丽的意象、俊逸的气骨，加上他特有的深厚的历史感以及由此形成的诗的深远开阔的视野，构成了杜牧诗歌的独特境界。

李商隐因不幸卷入牛李党争，一生处于从两党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境地，长期沉沦幕府。政治上的困顿失意，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尝开”（崔珣《哭李商隐》），却成就了

他在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许多政治诗直接反映了现实政治和重大历史事件，闪烁着犀利的政治锋芒和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其胆识和勇气超过了许多盛、中唐诗人。他的咏史诗多选取历史上因贪奢荒淫而亡国祸身的帝王为讽刺对象，以古鉴今，有强烈的政治讽喻意味。被誉为“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他笔下的抒情咏物诗极具个性色彩，深邃的意境，浓重的感伤情调，折射出晚唐特定的时代风貌和特定阶层的心理矛盾。尤其是他独创的无题诗，词采典丽精工，构思委婉曲折，寄托遥深，意境朦胧，有极大的艺术魅力。

李商隐不仅是晚唐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也是唐诗艺术形式发展更新的一个典范。经过初唐以来无数诗人的潜心创造，诗歌在语言、音节、句调、意象上已接近纯熟的境地，而李商隐竟然能够在前代大家创造的辉煌面前，继往开来，并有所超越，对古典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新的重要贡献。李商隐诗歌的风格，前人概括为“深情绵邈”或“沉博绝丽”。即是以细腻丰富的感情，富丽精工的语言，象征、暗示、比兴寄托等手法，迂回曲折的结构，细密精致的比喻、回环往复的抒情，捕捉富于表现力的意象，表达深细婉曲的情思，构成诗歌朦胧美的境界，最大限度地开掘出诗歌表现心灵的潜质，创造了唐诗最后的辉煌。

李商隐七律、七绝的艺术功力几乎达到了唐诗的顶峰，所谓“唐人无出其右者”（田雯《古欢堂杂著》卷二）。叶燮《原诗》也称：“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蔡宽夫诗话》引），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李商隐的影响从晚唐一直及于清代。

这一时期的诗人还有张祜、许浑、李群玉、韩 、韦庄等。他们的诗多以怀古伤今为主题，染上了浓重的感伤色彩，如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中展现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李群玉《火炉前坐》抒发的“多少关心事，书灰

到夜深”的感叹，都表明诗人已经体认到兴亡盛衰的不可抗拒。

杜牧、李商隐之后，随着王朝不可逆转的末日的来临，逃避现实，追求淡泊境界与清丽诗风成为诗坛的主要倾向。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诗歌，内容上以抒写山水风月、赠酬送别以及自身伤感情怀等为主，境界比较狭窄。形式上多五七言律诗，在捕捉意象、琢字炼句、把握节奏上有一定特色。

与此同时，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等一批诗人，感情愤时事、关怀民瘼，上继元、白的现实主义精神，以通俗的形式和语言，反映并批判晚唐社会现实。如皮日休《橡媪叹》、聂夷中《咏田家》、杜荀鹤《山中寡妇》等，都真实反映了晚唐广大农村破产、民不聊生的悲惨社会现实，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巧取豪夺的无情。笔锋犀利，感情愤激，议论深刻，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性。可惜艺术上比较粗糙，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也不够敏锐深入，因此影响不大。而且，就连这些诗人自己也把写诗的主要精力放在描写山水风月、抒发赠酬离别等题材上。至此，唐诗终于走完了它三百年的历程，在衰飒的时代氛围和感伤的情调中拉上了最后一道帷幕。